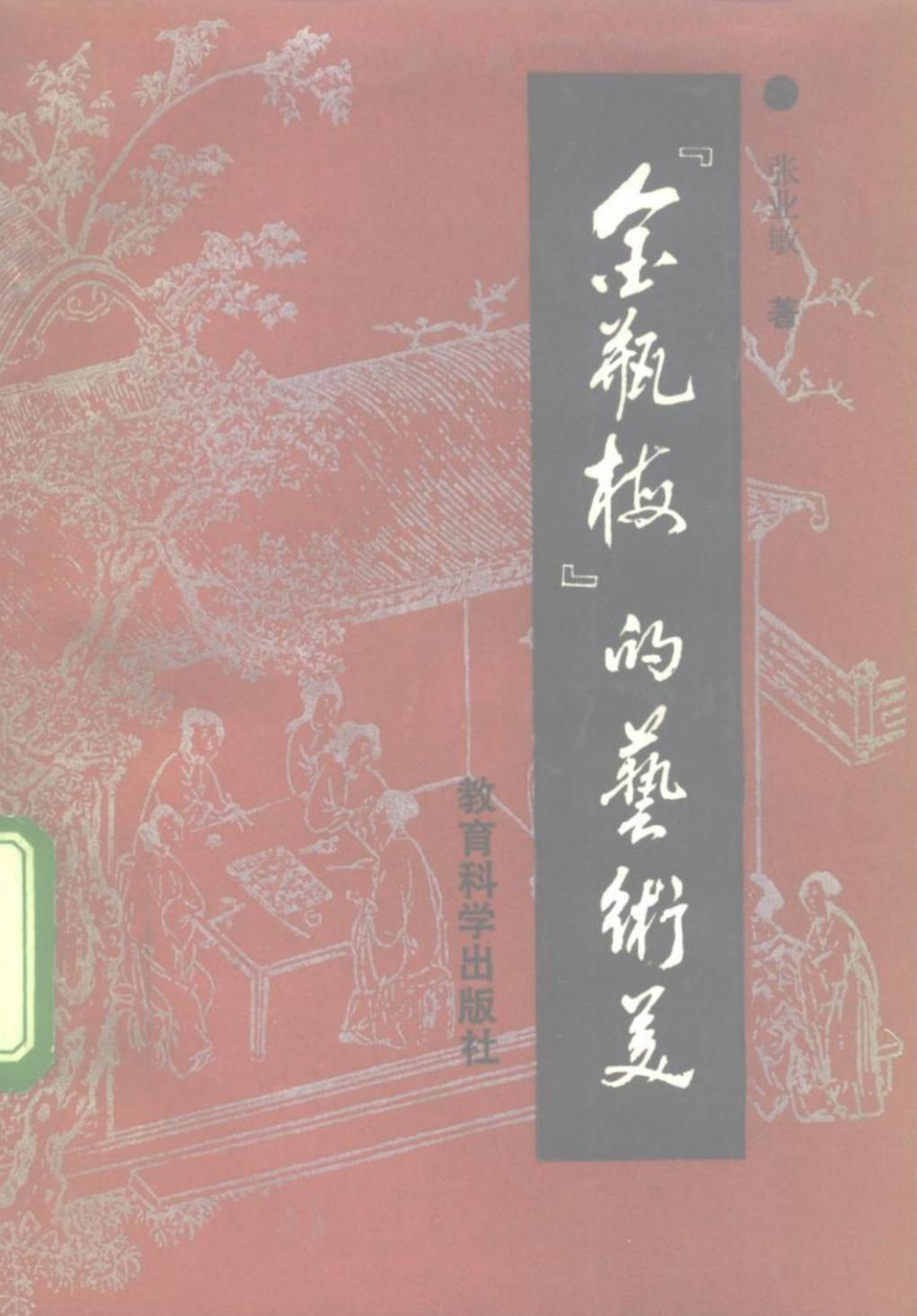


张业敏
著

『金瓶梅』的藝術美

教育科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第111号

封面设计：徐丹

责任编辑：轩辕轲

《金瓶梅》的艺术美

张业敏 著

教育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北太平庄·北三环中路46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廊坊人民印刷厂印装

开本：787毫米×1092毫米 1/32 印张：7.625 字数：150千

1992年10月第一版 1992年10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01—5,000册

ISBN 7-041-0875-8/1 · 001

定价：4.20元

内 容 简 介

本书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观点，通过纵横对比，分别从“化丑为美”的审美视角、现实主义小说的美学特征、典型化的人物塑造，以及独特的讽刺艺术、结构艺术、语言艺术等方面，比较全面地论述了《金瓶梅》的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的特色，并探索了小说作者的性意识和在性描写上的得失。阐明了这部长篇小说在中国小说史（特别是人情小说史）上的地位和影响，有助于广大读者阅读和理解《金瓶梅》原著和历代有关《金瓶梅》的研讨、评议方面的文章。

序

栗超然

《金瓶梅》确实是一部“奇书”，自问世以来四百多年，一直吸引着不同阶层的读者；然评论歧异之大，在历史上可谓罕见，而且无论是毁是誉，意见之激烈亦属少有。进入社会主义历史新时期以后，为了各种层次读者的需要，好几家出版社分别出版了各种版本的《金瓶梅》，有适合一般读者阅读的删节本，有缩写成故事的缩写本，有供研究人员使用的全本、评点本、影印本，一时间出现了人称“《金瓶梅》热”的热潮。对“《金瓶梅》热”如何看，姑且不论；但在这种热潮下，这几年《金瓶梅》的读者较之建国以来任何一个时期都大大增多，甚至可以说比前30年的总和还要多，在某种意义上说已经普及了，这是现实的情况。这种情况给我们提出了一个紧迫的问题：如何引导除研究者之外的广大读者正确阅读这部内容复杂、被称为“奇书”的古典小说名著。这应该是出版界、学术界、评论界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

这部“奇书”在中国小说发展史上，是有它独特的地位的。鲁迅先生《中国小说史略》中就很赞赏它的艺术成就，认为同时的长篇小说比不上《金瓶梅》。鲁迅先生以历史的发展眼光来看待《金瓶梅》是很准确的。鲁迅先生也指出了它里面性描写的猥亵，这是符合辩证法的评价。过去囿于成见，学术界对《金瓶梅》研究得不够，出版界亦视之为“禁

区”。随着改革开放，出版界“《金瓶梅》热”的兴起，文学研究对此也“热”起来，多次召开了全国性的学术讨论会，出版了研究专著，发表了数量可观的研究论文。这些，标志着《金瓶梅》研究已经开创了新局面。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发展，对于《金瓶梅》的研究，很可能象《红楼梦》研究有“红学”那样，也成为一门专门的学科分支——“金学”。

对于《金瓶梅》的研究，可以是多方面的，包括考证作者和版本源流，议论评点得失、探讨作品思想和艺术，以至整理方言俗语等等，都应该继续深入。然而，我觉得当前尤其需要以正确观点评析《金瓶梅》，深入浅出，指导一般读者包括广大青年读者阅读理解这部“奇书”。这也应该是“金学”的组成部分，甚至可以说是重要的组成部分。现在，这样的著作是太少了。张业敏副教授这部《〈金瓶梅〉的面面观》，正是把学术性和可读性结合得比较好的著作。业敏同志对《金瓶梅》进行过深入的研究，下了很大的功夫；又由于业敏同志理论修养比较深厚，所以研究能鞭辟入里，分析丝丝入扣；加以全书布局结构得当，自成系统，语言流畅，可读性强，可以说是一部既有学术性，也很切合广大读者需要的著作。

业敏同志对《金瓶梅》的总体评价——“丑恶现实的大曝光”、“现实主义小说发展的里程碑”符合作品实际，非常得当。《金瓶梅》写了许多的社会丑恶现象，但作者在展览丑恶的同时，也表现了一定的美的审视点。《〈金瓶梅〉的面面观》结合当时的时代特征，把《金瓶梅》摆在广阔的社会生活背景上，深刻分析了《金瓶梅》的批判矛头，以及

对社会腐败现象的深刻揭露；指出了《金瓶梅》对黑暗腐朽情欲的描写，给与了道德的判决。读者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才能够领略到《金瓶梅》的本质，才能够认识《金瓶梅》的意义。业敏同志又从现实主义小说发展的视角，论述了《金瓶梅》在文学史上现实主义创作发展的地位及其艺术表现风格。这从小说艺术发展的历史来说，也是恰如其分的。《〈金瓶梅〉的面面观》中对人物塑造的艺术分析尤为值得称道。以西门庆形象分析为例。作者从明代社会商业资本的萌芽，深入到西门庆这个人物市井商人的阶级本质；从其敛财发迹、官场钻营、对女性无止境的占有欲等方面深刻地分析了西门庆作为暴发户的人生价值取向，指出其人生悲剧与社会发展的必然性。这样的分析，在吸收一些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有新的开拓和新的深度。业敏同志在分析人物时，看到《金瓶梅》人物性格的复杂性，对人物的矛盾统一的性格，进行了多方面的探寻，对性格发展逻辑的辨析，可谓细致入微。而在对《金瓶梅》艺术立意的分析时，业敏同志紧扣其讽刺艺术作精到的阐述，使读者对《金瓶梅》意义的认识有恰当的切入点。这些都是难得的。其他对艺术结构、作品语言等方面的研究阐述，他也都有自己独到之处。

对于《金瓶梅》的研究评价，必然回避不了对它的性行为描写（即所谓“秽笔”）给予评论。如何评价文学作品性描写问题，应该是文学评论题中应有之义，是重要的课题之一。业敏同志对“秽笔”问题不作简单的肯定或否定，而是结合《金瓶梅》的时代风气、社会文化思想、作家的心理、创作方法等方面，多层次多角度地分析了《金瓶梅》这个突出问题，对此作出了自己的评价。这既可供《金瓶梅》的读

者阅读时参考，而对文艺批评上也有启发借鉴的意义。

业敏同志虚怀若谷，书成之后问序于我。匆匆读毕这部书稿，感到这是一部很有价值、将会得到雅俗共赏效应的著作，所以十分乐意写下自己阅读书稿的点滴感想，聊以为序。

辛未深秋序于相思湖畔未开轩

目 录

序	梁超然(1)
第一章	一部神秘的评说不一的大“奇书” ——《金瓶梅》的作者、版本、故事梗概及诸家评说	(1)
第二章	丑恶现实的大曝光 ——《金瓶梅》的审美视角	(20)
第三章	现实主义小说发展中的里程碑 ——《金瓶梅》的美学风貌	(40)
第四章	“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 ——《金瓶梅》人物塑造艺术之一	(65)
第五章	性格的“二律背反” ——《金瓶梅》人物塑造艺术之二	(89)
第六章	鲜明生动的“这一个” ——《金瓶梅》人物塑造艺术之三	(103)
第七章	“刻露尽相”与“幽伏含讥” ——《金瓶梅》的讽刺艺术	(122)
第八章	杂色、全息、立体地编织和组结生活 ——《金瓶梅》的结构艺术	(144)
第九章	文字积习，荡除净尽	

——《金瓶梅》的语言艺术	(166)
第十章 众体兼备的文学样式	
——《金瓶梅》中的韵文及其他非情节因素的艺术作用	(184)
第十一章 一个回避不开的问题	
——《金瓶梅》中的“秽笔”	(194)
第十二章 小说历史发展锁链上的一环	
——《金瓶梅》的艺术影响	(215)
后记	(233)

第一章

一部神秘的评说不一的大“奇书”

——《金瓶梅》的作者、版本、 故事梗概及诸家评说

远在16世纪初，我国即已出现了《金瓶梅》这样一部具备了近代现实主义流派小说性质的文学巨著。它的出现，比近代现实主义小说大师巴尔扎克的作品早了两个多世纪，比另一个现实主义小说大师托尔斯泰的作品更要早三个世纪。在我国以至世界小说发展史上，它的出现确实是一个奇迹，而小说本身也确实堪称是一部名副其实的“奇书”。当这部“奇书”刚一问世，便立即震动了当时的文坛和社会、誉之者拿它和《水浒传》并列，称为“外典”“逸典”（沈德符语），其后又配《西厢记》，号称“三大奇书”，而以它为首，称“第一奇书”；毁之者竭力诋毁咒骂，斥为“诲淫”，以“淫书”目之，把它看得简直比洪水猛兽还可怕！阅过者称“奇”称“快”，未阅者“恨未得见”，深以为憾。同时又由于它的作者不明，内容繁富而倘恍，人物众多且色彩驳杂，因此三百多年来，引起人们对它探索的广泛兴趣——从猜测它的作者、成书经过和创作年代，到探求它的“寓意”，查究它的本事，以及评估它的思想艺术价值，大多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同一件事，不同考证者说法相距千里；同一个问题，不同评论者的是非论判竟截然不同。加以四百年

来，《金瓶梅》在大多时间内列为禁书，使广大读者想看而不得，这就更使它笼罩在一层神秘的烟雾之中。

1

《金瓶梅》的作者是谁？这是至今尚未能揭开的一个谜，以至于有人把这个问题列入了“中国文化之谜”。

当《金瓶梅》最早尚以手抄本流传的时候，人们就不知其作者为谁。明人袁宏道最早提出《金瓶梅》的作者问题。他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惊问抄本“由何得来？”可见他不知作者为谁。与他同时的谢肇淛作《金瓶梅跋》，也说抄本“不著作者名代”。但袁宏道的弟弟袁中道和谢肇淛都据传闻，一说作者为一“绍兴老儒”，一说作者为某金吾（官名）的门客，但都不足信。稍后的沈德符在其《野获编》中说：“闻此为嘉靖间大名士手笔，指斥时事，如蔡京父子则指分宜（严嵩），林灵索则指陶仲文，朱勔则指陆炳，其余各有所属云。”沈德符在当时是颇有名气的史学家，他的话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在这段话中，他虽然也没有明白指出《金瓶梅》的作者是谁，但却指出了小说创作的年代（嘉靖年间），而且是一位“大名士”的手笔，小说中所写的事件都是为了影射嘉靖时的现实（“指斥时事”）。这样就把人们对《金瓶梅》作者考证和寻觅的范围大大缩小了。于是明末清初有人便根据沈德符这一提示，推断《金瓶梅》作者当为跨嘉靖、隆庆、万历三朝的著名学者、“后七子”的首领、大文学家王世贞，理由是王世贞与严嵩父子有杀父之仇，而且在山东当过官（小说中所记多为山东的事情），对山东的风土

人情有所了解，又是当时首屈一指的“大名士”。为了坐实这一点，他们还编织了一个富于传奇性的“孝子复仇”的故事。据清人顾公燮《消夏闲记》中记载：

太仓王抒家藏《清明上河图》，化工之笔也。

严世蕃强索之，抒不忍舍，乃觅名手摹质者以献，先是，抒巡抚两浙，遇裱工汤姓，流落不偶，携之归，装潢书画，旋荐于世蕃。当献画时，汤在侧，谓世蕃曰：“此图某所目睹，是卷非真者、试观麻雀，小脚而踏二瓦角，即此便知其伪矣。”世蕃恚甚，而亦鄙汤之为人，不复重用，会俺答人入寇大同，抒方总督蓟辽，鄢懋卿嗾御史方辂劾抒御边无术，遂见杀。……抒子凤洲（世贞）痛父冤死，图报无由。一日偶谒世蕃，世蕃问：“坊间有好看小说否？”答曰：“有。”又问：“何名？”仓卒之间，凤洲见金瓶中供梅，遂以《金瓶梅》答之。但字迹漫灭，容钞正送览，退而构思数日，借《水浒传》西门庆故事为蓝本，缘世蕃居西门，乳名庆，暗讥其閨门淫放。而世蕃不知，观之大悦，把玩不置。相传世蕃最喜修脚、凤洲重赂修工，乘蕃专心阅书，故意微伤脚趾，阴擦烂药，后渐溃腐，不能入直，独其父嵩在阁，年衰迟钝，票本拟批不称上旨。上寝厌之，宠日以衰。御史邹应龙等乘机劾奏，以至于败。

另外还有些说法，如说在严世蕃面前谮杀王抒者不是汤姓裱工，而是明朝中后期的散文流派唐宋派的唐顺之，问王世贞讨小说看的也是唐顺之。“荆川（顺之）索之急，凤洲归，

广召梓工，旋撰旋刊，以毒水濡墨刷印，奉之荆川。荆川阅书甚急，墨浓纸黏，卒不可揭，乃屡以纸润口津揭书，书尽毒发而死。”（《寒花盦随笔》）；有的说被毒杀的就是严世蕃本人；还有的传说将《清明上河图》换成《辋川真迹》（刘廷玑《在园杂志》），清人《缺名笔记》更记载唐顺之死后，有白衣人前来吊丧，“伏尸而哭，哭已再拜而出。及殓则一臂不知所往，始悟来者即著书之人，因其父受缳首之辱，进鸩不足，更残其肢体，以为报也。”简直越传越神越奇！这些故事的情节虽有出入，但却都共同指证王世贞是《金瓶梅》的作者。

《金瓶梅》为王世贞所作，一直到近代许多学者还深信不疑，其间也有个别人怀疑过“王世贞说”，但因推翻此说犹嫌证据不足，未能引起学术界的重视。

到了本世纪，1932年，北平图书馆（今北京图书馆）从山西省收购到了一部明刻本《金瓶梅词话》。经研究，认定这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最早刻本（虽然仍为翻刻本）。这个刻本正文前列有“欣欣子”《序》，“廿公”《跋》和“东吴弄珠客”《序》。在欣欣子的《序》中，指明小说作者为他的朋友“兰陵笑笑生”。有人认为这个作序的“欣欣子”其实就是作者“笑笑生”，但“欣欣子”与“笑笑生”显然都不是作者真名。主《金瓶梅》为王世贞著的人便立即说“笑笑生”就是王世贞。按山东省峄县和江苏省武进县，古时均曾名“兰陵”，鲁迅先生认为，王世贞虽是江苏武进县人，又曾到过山东做官，但从《金瓶梅》中使用大量山东方言来看，决不是江南人所得措手于其间的，因此判断作者是山东人之说更符情理。其后，著名明史专家吴晗先生在其专

论《〈金瓶梅〉的著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中，以大量确凿的证据论证了《金瓶梅》是万历中期人所著（而王世贞主要生活在嘉靖、隆庆时），稍后，郑振铎先生对欣欣子的《序》加以研究，说明欣欣子、笑笑生当是万历时期的人，绝对不会是嘉靖时期的人。这些有力的考据和论证，彻底否定了“王世贞说”。

但这位山东省峰县的笑笑生（或欣欣子）究竟是谁？在《峰县志》中，始终找不出关于笑笑生（或欣欣子）一丝一毫的消息来，所以《金瓶梅》的作者至今仍然是一个未揭开的谜。

除了上述认为《金瓶梅》的作者是“绍兴老儒”，或“金吾门客”，或“嘉靖年间大名士”，或王世贞，或笑笑生外，古今研究者提出的作者名单还有“世庙一巨公”、“王世贞门人”、卢楠、李渔、徐渭、薛应旗、赵南星、冯惟敏、李贽、吴依、贾三近、屠隆、冯梦龙、汤显祖、李开先、刘九等等。其中主要的、能言之成理、论证充分的说法有四：一是天津师大朱星先生力主传统的王世贞说；二是杭州大学徐朔方教授力主李开先说——但他认为《金瓶梅》根本不是由文人独自创作，而是象《水浒》《三国》《西游》那样由世代积累，经李开先将流传的有关故事收集整理而成；三是徐州师院张远芬教授力主贾三近说；四是复旦大学黄霖教授力主屠隆说（台湾魏子云先生亦主此说）。最近，又有《金瓶梅》专家王营、王连洲、张荣楷等人经多年考查，认定作品中的大量方言乃是书中交代的故事地点清河县的邻县临清（古属山东，今属河北）方言，书中提到的八十余处景点、景观，在临清县志中亦可查到，因此断定临清为《金瓶梅》故事的发生地。这一说法已为海内外学者所基

本认同（所以第二届《金瓶梅》学术讨论会在临清召开）。香港有学者在《大公报》载文，认为作者即明“后七子”之一的谢榛，理由是谢为临清人，是嘉靖名士，做过京官，也是地方“显宦”，对明后期朝野黑幕知之甚详，又擅长文学，为人诙谐狡狯，生活放荡淫佚，由他著《金瓶梅》最有可能。近年来，国内学者许志强经考证，从生卒年代、时代特点、个人经历、思想心态等十余方面，论证《金瓶梅》的作者应是古兰陵人贾梦龙。这些说法都言之成理，但目前尚未为学界所认可，仅介绍于此，聊供读者参考。

看来，要对《金瓶梅》作者作出明确判断，尚须学者们去作进一步考查和发掘新的论证材料。但我们相信，这一天总会到来的。

2

吴晗在《(金瓶梅)的著作年代及其社会背景》一文中，他根据这部小说多处写到万历年间发生的一些历史事件，考定它的成书年代不会早于万历十年（1582年），最早也不能早于隆庆二年（1568年）。尽管建国以来，一些学者在各自的论著中对吴文中的一些结论提出诘难，坚持“嘉靖说”亦大有人在（如周钩韬《关于(金瓶梅)的时代背景的再思考》），但吴文的结论仍是令人信服的：《金瓶梅》这部小说，大约产生在明代的万历年间。

《金瓶梅》的版本，有多种类型：

第一种是抄本。袁宏道《与董思白书》中说：“《金瓶梅》……后段在何处抄竟？当于何处倒换？幸一示。”袁中道《游居柿录》中亦称：“……从中郎真州，见此书之半。”

又，屠本畯《山林经济籍》中说：“按《金瓶梅》流传海内外甚少……王大司寇凤洲先生家藏全书，今已失散。”沈德符《野获编》中亦称：“丙午，遇中郎京邸，问：‘曾有全帙否？’曰：‘……今唯麻城刘延白承禧家有全本，盖从其妻家徐文贞录得者。’又三年，小修上公车，已携有其书，因与借抄挈归。……遂固箧之。未几时，而吴中悬之国门矣。”又，李日华《味水轩日记》中记：“十一月五日，沈伯远携其伯景倩所藏《金瓶梅》小说来……”这些材料都说明《金瓶梅》在刻印之前，是以各种手抄本形式在社会上流传。当时拥有抄本的有徐阶、王世贞、刘承禧、董其昌、袁宏道、袁中道、沈德符、文在兹、谢肇淛等一批士大夫阶层中的人物，但这些抄本都未能传世。

第二种是刻本。据知，《金瓶梅》初刻于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但没有传下来。现存世最早的刊本《新刻金瓶梅词话》一百回是初刻的翻印本（以下简称“词话”本）。此本传世完整的有三本：其中两本分别藏于日本日光山轮王寺慈眼堂和德山毛利氏栖息堂。日本国大安株氏会社曾于1963年“据两本补配完整”影印出版过一次。第三本即前述1932年北平图书馆，从山西收购到的一部明刻本，原藏北平图书馆，现藏台湾故宫博物院。从1933年到现在，据此本的排印本有十余种，大陆常见的有1957年文学古籍刊行社据1933年古佚小说刊行会影印本的重印本，198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校点本（删19161字）。

第三种是改编本，即《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一百回（以下简称“新刻”本），回前有图，共一百零一帧，刻于明末崇祯年间（1628—1644）。这是根据《金瓶梅词话》初刻本删

削，增饰和修改而成——删去了《词话》中大部分词曲韵文，砍去了一些枝蔓，对《词话》中明显的破绽进行了修补，使回目变得整齐对仗，减少了一些山东土白，结构上也作了一些调整。此本传世的有数种，北京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和日本内阁文库、天理图书馆都各有藏本，各藏本正文的旁批大同小异。近年来北大图书馆藏本已由北大出版社影印发行（该本除旁批外，还有眉评）。

第四种是评点本，即《皋鹤堂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一百回，为清初彭城人张竹坡评本。初刻于康熙乙亥（1695）年，首有序，正文前有张竹坡对小说的几种总评文字（“竹坡闲话”，“金瓶梅寓意说”、“苦孝说”、“金瓶梅读法”、“冷热金针”等），正文内有眉批、旁批、行内夹批，每回前都有回评。该评本是以上述崇祯本为底本，正文仅在字词等方面略作改动，为清代以来的通行本，翻版甚多，大体可分为有回评与无回评两个系列。台湾、香港所印行的多据此本。近年来国内齐鲁书社出有此本校点本（删10385字）。

第五种是伪本。清乾隆以后，出现了各种低劣的《金瓶梅》印本，大多冠以“古本”“真本”名，以招揽顾客。这些印本，大多根据上述《第一奇书金瓶梅》大删大改而成，完全失却《金瓶梅》本来面目，错漏迭出，所以姑称之为“伪本”。近几年来在“扫黄”中查抄出的由地下书肆滥印的《金瓶梅演义》和其他各种《金瓶梅》版本，都属于这一类。

3

《金瓶梅》故事原是由《水浒传》第22回至第25回叙写